

美中关系史论

● MEI-ZHONG GUANXI SHI LUN ● MEI-ZHONG GUANXI SHI LUN

欧内斯特·梅
小詹姆斯·汤姆逊 编





美 中 关 系 史 论

——兼论美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

[美] 欧内斯特·梅 编
小詹姆斯·汤姆逊

齐文颖等 译
齐文颖 校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17 7524 9

责任编辑：郭沂纹

责任校对：沐 波

封面设计：谭国民

版式设计：王丹丹

美中关系史论

Mei-Zhong Guanxi Shilun

[美]欧内斯特·梅等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总 经 销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75印张 2插页 352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004-0722-X/K·85 定价：6.90元

《美中关系史论》译者名单

(按姓氏笔划为序)

齐文颖 严四光 郑亚英 杨大业
姚学吾 徐 薇 阎广耀 谭圣安

译者序

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成绩，取得了显著成果。50—60年代出版了几部有份量的著作，像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二卷本。翻译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美国学者的著作如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还翻译出版了一些重要资料。与此同时，在大学的历史教科书及有关的著述中都有专门章节论述中美关系。总观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著作，多偏重于政治、外交、华工等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我国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些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还设置了专门的课题组、开出了专门化课程，培养了研究生。特别应当提出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对外关系史研究室主持召开的几次全国性的中美关系史讨论会，对于活跃学术空气、推动我国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与前一时期相比、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上自“中国皇后号驶华”，下至当代的中美关系均有所涉及；研究的领域拓宽了，从政治、经济、法律直到文化、思想、教育等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专著与文章。翻译了一些重要著作、如果我们再从近年来研究的毕业论文来看，更是硕果累累，美不胜收。

然而，当代美国学者如何看待二百多年来的中美关系，他们对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情况如何？出版了哪些著作？主要学派和主要观点如何？……都是我国学者和有关研究人员所关心的问题。我曾利用在美国作研究的机会，到有关图书馆查阅资料，也曾向

著名教授请教，他们几乎都众口一词地向我推荐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教授主持编辑的《美国与东亚关系》一书。尽管它的书名是《美国与东亚关系》，然而它的内容却主要偏重于美国对中国的关系；尽管它出书的时间为1972年，然而它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至今仍未过时，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与专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在一本书中把二百余年来中美关系在各各历史阶段的重要著述、评论、资料及研究生学位论文等都包括在内，并作出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有代表性的评论，至今还很难觅得。因此，决定组织同行将此书有关章节译出并取名《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

为了使阅读本书的同志更好地了解它的内容与观点，有必要把它出版的背景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对东亚关系史研究方面最系统和最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二，即1922年出版的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和1938年出版的格里斯沃尔德著《美国的远东政策》。前书主要论述19世纪的美国对华关系，同时也论述了美国同日本及朝鲜的关系，并追溯到以前的时期。后者所包括的时间范围是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两书前后衔接、相互补充，构成了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与东亚关系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站在美国立场、主要使用美国方面的材料写成的。他们所建立的体系、主导思想、和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一直为美国研究东亚关系史的学者奉为圭臬。这两部书也是每个主修东亚史大学生的必读课本。其影响是很深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美国在朝鲜及越南的失败、以及日本的经济复苏等，不能不引起美国学者对丹涅特——格里斯沃尔德所建立的美国与东亚关系史学体系的反思。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国际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强权到霸权，也需要调整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为此也需要对以前的有关著述进行检验并作出评

价。此外，新档案的公布、新学术著作的出版、新观点的提出也需要进行分析与整理。1970年在墨西哥卡那瓦萨举行的、由美国历史学会出面组织的，美国与东亚关系史研讨会便是在这一形势下召开的。与会代表25人，按照事先布置，17位提供论文在会上宣读，余者则参加评论提出意见。他们都是这一领域的饱学之士、或有见地的年轻学者。其中著名的有，除上述欧内斯特·梅之外，尚有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费正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多萝西·博格、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历史系刘广京教授、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入江昭教授等，在会上报告的论文经过讨论修改之后，由欧内斯特·梅与小詹姆斯·汤姆逊二人负责编辑出版，便成《美国与东亚关系》一书。

本书最明显的特点有二：

一、全面而系统地评述了美国学术界自19世纪中期以来直至20世纪60年代对美中关系以及美国与亚洲其它国家关系的研究情况、出版著作及主要观点。书中所列举的著述除专著、论文、资料、档案、文献汇编、回忆录外，尚包括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等，总数约在千种以上。美国学者凡是在70年代之前所作出的主要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均在评论的范围之内。

二、由专家执笔，他们对美中关系的见解不仅是他们长期研究的结果、并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美国学术界对美中关系以及美国与亚洲各国关系研究的新倾向。譬如在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中由丹涅特——格里斯沃德所建立的以领事、外交官、国务院官员活动为主体的史学体系已受到批评，而要求扩大到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同时在运用资料方面，除本国资料外也要求借助对方国家的档案与著作，否则不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好几位学者都说到研究美中关系时掌握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化的重要性、费正清教授并举例指出研究中英关系时，不仅要掌握英文兰皮书的内容，还要读懂弄清蓝皮书中文本的内

容。这里还应当提到的是美国早期对华贸易不仅是他们早期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最重要的是通过肮脏的“鸦片贸易”为早期芝加哥、伯明翰、昆西铁路的修建提供了资金。然而“鸦片贸易”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决不仅止于此，这是他们准备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之一。在研究美中关系的同时，并结合对美国同亚洲关系的研究并进行，这也是他们研究美中关系的一个新趋势。对于60年代之后美国与东亚各国关系的研究在本书最后一章进行了扼要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应当指出，美国学者的著作即便是有学术价值的重要工作，由于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影响，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将此书翻译出来仅供参考。

参加本书翻译的大都是长期从事中美关系史及美国史研究的同志。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严四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齐文颖、副教授谭圣安、郑亚英，天津农学院英语系教授阎广耀，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讲师杨大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教学部讲师徐薇，以及现正在美国从事教学工作的，原北京大学公共英语教研室姚学吾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多次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宣兆鹏先生的指教，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徐绪典先生还参加了本书第一章的校订工作。此外在抄写及译名校对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美国史专业研究生杨玉圣、张宝玮、胡新军、郑文鑫、陆丹妮、秦玉成、张雄以及齐小玉、周洁等大力协助，英文打字部分全部由北京大学燕京美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吴政同同志承担。还应当提出的是在组织与校订工作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沂纹同志作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前编辑部的徐葆初同志也给以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此书是很难完成的。谨此致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在翻译与校对过程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齐文颖 1990年6月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目 录

从“中国皇后号”到第一次门户开放，1784—1899年

- 一、早期美国与东亚的关系爱德华·格雷厄姆 3
- 二、19世纪中叶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 21
- 三、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与中国刘广京 40

从门户开放到华盛顿会议

- 四、追求帝国杨曼琳109
- 五、1901—1906年雷蒙德·埃斯修斯124
- 六、1906—1913年查尔斯·诺伊136
- 七、1913—1917年伯顿·比尔斯156
- 八、1917—1922年罗杰·丁曼175

从华盛顿会议到珍珠港

- 九、1922—1931年入江昭211
- 十、1931—1937年小沃尔多·海因里查斯237
- 十一、1937—1941年路易斯·莫顿255

从珍珠港到现在

十二、美国与中国革命 (1942—1946年):

一种解释 吉姆·皮克293

十三、杜鲁门时代 罗伯特·第尔列克335

十四、艾森豪威尔年代 莫尔顿·哈尔柏林359

十五、对20世纪60年代历史的初步

观察 小詹姆斯·汤姆逊374

索 引..... 398

作者简介..... 428

从“中国皇后”号到 第一次门户开放

1784—1899年

一、早期美国与东亚的关系

爱德华·格雷厄姆

在关于 1784—1839 年这一时期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编纂学中，存在着两个主要情况：一即这类著作为数有限，二是近 40 年来所写的则更少。学者们只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初步的接触，就会感到资料的贫乏与陈旧。给人们最突出的印象是：用布满灰尘的著作去研究早年的历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要从中美关系的开始时期进行观察。因为只有对有关订约之前的情况有所了解，才能对后来的历史进展有所认识。这正是本文提出的主要研究问题之一。

19 世纪末，美国对远东的兴趣戏剧性地再次浓厚起来，这对于这一阶段美国与远东关系的学术研究和美国远东外交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人们对这一课题仍有浓厚兴趣。现在通行的有关早期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标准著作都是本世纪头 30 年里写成的。由于有些是属于概论性的著作，因而把早期阶段写成是美国与东亚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的序幕。还由于这些著作多出于外交家们的手笔，他们又受到外交事件的左右，因而他们经常把条约和协定设想为说明人民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富有效果的资料，并认为美国在处理当前与东亚关系一切问题上的理想和行动，都可以从美国过去的行为中得到说明。

1930 年以后，人们对订约前历史的兴趣显著地下降了。其最明显的原因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更为现实的问题上，试图通过对 20 世纪中美关系的分析来了解它们。通常是充满离奇、浪漫和传奇

式故事的所谓“古老的中国贸易”，已经不再受青睐而悄悄地变成背景。与此同时，由于某些纯学术的考虑，使学者们对这个领域中学术上的兴趣减弱了。赖德烈^①和福斯特·雷亚·杜勒斯^②在他们写的早期美国与东亚关系的论著中，以及泰勒·丹涅特^③在总论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有关篇章里，都已对这一时期出版的材料中的许多原始资料作了充分的发掘。长期以来还流传某些消息：说是有些可以利用而没有公开发表的资料（这向来是个问题），一直堆放在东海岸的大约6个图书馆里。^④由于以上事实，加上近代可供研究的课题数量大，紧迫性强，又有许多现成的文件，造成这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实际上得不到鼓励的现象。例如在柯蒂斯·施图克所著《关于亚洲研究的美国博士论文，1939—1958年》^⑤一书中，列举了46篇中美关系的博士论文，其中只有17篇涉及20世纪前的时期，而且仅有4篇论及顾盛条约以前的时期。

这种长期忽视订约前阶段历史的现象，应该结束了。在美国与东亚关系目录学讨论中，列举了最近出版的几本著作的作者们，已找到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期他们各自研究题目的起因。但存在的问题是：研究这一段历史对于了解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全貌会起什么作用？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变化与连续性相对立的老问题的特殊表述。

从中国中心的观点看，历史的连续性比较容易理解。中国人

① 《中美早期关系史：1784—1844年》(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耶鲁大学出版社，1917年版，康涅狄格文理学院院报，卷20，8月号(1917年8月)第1—209页。

② 《早期中国贸易》(The Old China Trade)，波士顿，1930年版。

③ 《美国人在东亚：19世纪美国对远东政策评述》(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纽约，1922年版。

④ 刘广京的著作改变了上述的情况。参照刘广京：《美国人与中国人：历史论文和目录》(Kwang-Ching Liu's Americans and Chinese: A Historical Essay and a Bibliography)，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⑤ 康乃尔大学，远东系，《东南亚研究专题》(Southeast Asia Program)，1959年版。

的历史观强调循环和外观，这就使得他们把美国人看作是另外一群外来的“蛮夷”。他们出现在中国大门前比较晚，甚至比西方人晚。在这段时期内，“蛮夷”接近中国的策略多种多样，但这时的中国人已不像对许多其他外来者的反应那样强烈，因为在美国人到来之前已经有了历史的先例。即便有人用更加实用主义的方法对待中美之间，或更广泛地说亚美之间的接触，把“早期中国贸易”看作是一个性质不同的特殊阶段，这也意义不大。贸易情况的改变纯粹是经济的作用，而不是由于条约的作用。虽然传⁵教士是根据第一批条约取得有限的合法地位的，但是他们的方法和动机在订约后变化很小，而且主要是为了适应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文化条件的变化。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对某些美国人来说往往是很重要的问题，即：这些外来的美国人和其他的外来者相比，在对待亚洲人及其政府的做法上是否有明显的不同？从美国人对待这段历史的见解来看，很难作出回答。

这几行文字的分析也许不能使研究这段历史的美国人完全满意，但是这里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在两种根本不同的对立的⁶文化概念中，人们对一些事件的看法可能不时有些差异，但对基本轮廓的想法和态度却大体相同，这一观点最终可能成为了解美国与东亚关系全部过程的最有效途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不到两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的头半个世纪就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那些基本想法与态度第一次在具体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时期。甚至还有一种更为现实⁷的看法，认为它事实上是亚美关系史上许多典型的方面已显示出来的时期。至少是美国利益正在扩大，复杂程度也正在增长的萌芽时期。中国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所反对的那些观念和价值，正是被美国人当作社会标志的那些东西。结果在美国人中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一部分人对东亚的兴趣主要着眼于进行剥削，而另一部分人的兴趣主要是打算改善。这些无疑都是整个东亚与美国关系范围内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如果能够看到它们最初几十年所实际存在的根源，即不仅仅是把这最

初几十年当作“背景”来看，而是看作全部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对于了解亚美关系的发展，就会更加清楚明白了。

泰勒·丹涅特所著《美国人在东亚》，是美国人所写的早期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杰作，称誉史坛近50年。毫无疑问，凡是进入这一领域的大学生首先要读这本书，或许可以用来作为一门通论课程的教科书。研究生在写学位论文时，也很少有不把丹涅特的书作为案头著作的。尽管这部书已过时，但它仍然是有关这方面唯一的概论性著作。这本书对订约之前的时期作了详尽的论述，同时对订约之后美国与东亚关系发展的论述给人们一种连续感。丹涅特对这一段历史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如果不是支配、也是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大多数以后的专门著作和外交通史著作。虽然他争辩说订约前时期是“没有政治意义的”，但是他却认为美国商人对于广州特殊环境的适应，却形成了后来全国政策的原型，特别是关于门户开放政策和美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政策。^⑥

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关解释，丹涅特所凭借的是19世纪美国人的大量著作，他们大部分人的结论都是相似的，即美国人的行事特点是对东亚人民和政府持负责和尊敬的态度。这种传统的说法，从技术上来说，是根据原始材料来的。但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编纂学中，很难用传统的方法划分出原始资料和第二手材料。像丹涅特一样，现代学者将会发现许多19世纪第一手的记载不仅是详尽资料的无法估价的宝库，还可以看到它们包含了美国对远东各民族态度的那些声明是以传统说法为根据的。

人们要想对这一阶段的情况有一个简要的了解，读三位作者的著作就足够了。它们不仅在丹涅特的研究中占重要位置，而且

^⑥ 参照欧内斯特·梅《影响历史学家态度的因素：泰勒·丹涅特》（Ernest R. May, *Factors Influencing Historians' Attitudes*; Tyler Dennett），载多罗西·博格编：《历史学家和美国远东政策》（Dorothy Borg, *Comp. Historians and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临时增刊，纽约，1966年版。

还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事实与见解，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来说，仍是有用的材料来源。山茂召是第一个到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美国人，也是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他将自己的经历作了精心记载。他的日记是在其死后60多年出版的。^⑦罗伯特·福布斯是鸦片危机年代（1839—1842年）在广州的美国商人的非官方发言人，他当时出版了一本自辩书^⑧约在30年之后，又出版了一本自传。^⑨威廉·亨特于1829年至1842年间在广州的旗昌洋行工作，后来写了两篇关于订约前阶段的闲话记事。^⑩这三个人著作中的中心主题都同样讲的是中国情况，特别是写了关于广州的商业机构和在那里的舒适生活。福布斯对中国人的看法最为苛刻，亨特是一个不怕别人议论的亲华派，因而他对此后许多美国人关于这一时期的著作都起着重要作用。因为他对订约前时期广州情况的详细报导，已成为标准的通行著作的主要材料来源。后来在大多数这类著作中所贯穿着的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敬意和亲善关系，应当归功于亨特。

有两部关于亚美关系的通论性著作是把本世纪初美国人对远东兴趣再度高涨作为重要内容来论述的，即詹姆斯·卡拉汉的《美国与太平洋和远东的关系》^⑪和约翰·福斯特的《美国对东方

⑦ 周西亚·昆西主编：《山茂召少校日记，美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附作者传》（Josiah Quincy, ed., *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 Canton,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波士顿，1947年版。

⑧ 《中国和中国的贸易评论》（*Remarks on China and the China Trade*），波士顿，1844年版。

⑨ 《回忆录》（*Personal Reminiscences*），波士顿，1878年版。

⑩ 《旧中国散论》（*Bits of Old China*），伦敦，1955年版；和《广州“番鬼”录：1825—1844年》（*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伦敦，1882年版。台北成文印书局于1965年翻印了《广州“番鬼”录》一书，1966年又翻印了《旧中国散论》。这两本书在王克私的《亨特关于旧广州洋行的著作》（Philip de Vargas' *Hunter's Books on the Old Canton Factories*）一文中均有评论，载《燕京社会学报》卷2第1期7月号（1939年7月），第97—117页。

⑪ 载《约翰·霍布金斯历史和政治研究集》卷19第1—3册，巴尔的摩，1901年版。